

音樂研究

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音樂研究

1958年 第3期

6月15日 出版

短論

“厚古薄今”和“重外輕中”都要不得!吳 異 2
要積極參加新的“采風”運動楊 琦 4

艺术科学座談会上的發言 (以發言先后为序)

祝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空前繁荣譚抒真 陈 洪 6
勤學苦幹,又紅又專,爭取音乐科学研究工作的躍大進!李元庆 7
我們的成績和我們的躍進查卓西 11
展开中国音乐史的科学研究工作阴法魯 13
打掉邪氣,开展民族化、大衆化的音乐科学研究工作廖輔叔 15
以最大的革命干劲,苦战三年易劍泉 16
在偉大的党的力量的推动下不断躍進楊蔭浏 17
音乐科学研究必須重視民族音乐的优良傳統潘怀素 20
音乐科学工作必須隨着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向前躍進!呂 驥 22
个人初步躍進計劃和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李純一 23
情况、规划和建議王玉西 25

中国音乐、詩歌与和声沈知白 26

劳动呼号和艺术創造 (學習聶耳創作筆記之一)李業道 45

荀子乐論篇淺解梁启雄 51

古曲《三宝佛》的形式結構蔣小风 59

論川剧高腔音乐 (續)沙 梅 66

聶耳早期的作品《靜夜》的疑似譜联 抗 82

对《中国音乐史綱》的一些意見裴道思 84

僮族的蜂鼓 (中国兄弟民族乐器介紹)簡其华 88

編后記·学术动态



短论



“厚古薄今”和“重外輕中”

都要不得！

吳 巽

“厚古薄今”这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术界、知识界的揭露和批判下，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它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危害。在最近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在批评“厚古薄今”的同时也批评了“重外輕中”的倾向。周扬同志曾在这个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表现在文学艺术界的“厚古薄今”和“重外輕中”的倾向，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所以說，这两种倾向都同样要不得，都应该反对。

在音乐领域内，“厚古薄今”虽不能說已经成为严重的倾向，但是据我们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确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厚古薄今”思想。不久以前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科座谈会上有同志指出过：有一些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者，对于当前文艺界、音乐界的许多重大问题(如音乐思想方面的修正主义、黄色音乐问题、社会主义歌咏运动问题等)，采取旁观的态度。有的同志并且检查了自己的“厚古薄今”或“重古輕今”思想。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有些研究工作者整天埋首于故纸堆中，不仅不去研究音乐界的现状，甚至连新作品的演出也不屑于一听。

再如，从《音乐研究》编辑部这个范围直接接触到的一些现象看来，也能說明

“厚古薄今”的倾向的确存在于理论研究工作中。编辑部所收到的稿件以及约定要为《音乐研究》写的选题，其中研究古代音乐和音乐史问题以及考证或解释古曲、古书的较多。总的說来，就是谈十九世纪以前的问题和纯技术性的文章比重最大，而分析研究现代音乐问题的相当寥寥。有一些稿子非常缺乏目的性，表现出一种脱离实际的烦琐主义。比如有的人为考证一个生僻的专门名词，不惜花了很大气力，引证了很多古书，写成万余言的文章，结果还是使人搞不清楚这个名词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比如有人用很大篇幅来阐释古代乐律或者古代调式，其中充满了枯燥无味的数字和图式，但是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当然，研究古代的音乐，考证名词或乐律、古调，只要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规律及其发展，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采取像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脱离活的材料、从书本到书本、抛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明确目的性、为“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来搞研究工作，是很成问题的。我们怀疑究竟这种做法能对真正接受民族音乐遗产有什么裨益。老实說，用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遗产并不是真正爱护遗产。它和对待古典遗产需要“取其精华、棄其糟粕”使之推陈出

新的馬列主义方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搞科学研究工作必須要使“古为今用”，忘記这个目的来搞任何研究工作都是要落空的。

还有就很少对当前音乐美学思想、創作傾向和現代中国作曲家以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文章。据我們所知許多完全有条件在这方面大可作些工作的同志，也很少把这类問題的研究列入个人的规划中。固然，客观情况是：專業搞理論研究工作的同志太少，其他大多数都是把理論研究当做副業，因此常常是被挤了的。但是，今天迫切需要进行兩条道路的斗争，需要深入的思想大辯論，以逐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以及目前發生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正視历史和人民向我們提出的这项任务，那么我們又怎样对得起人民呢？从这些情况看来，可以肯定地说，“厚古薄今”在音乐科学、理論研究方面是存在的，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至于談到“重外輕中”这一种思想，在音乐界倒不什么新东西。我們过去所反对的“盲目崇拜西洋”、“輕視民族傳統”就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这种傾向曾長期存在于我国音乐領域，經過好多次的斗争，是有所改变的。而特别是在这次整風中，“重外輕中”的思想表現得比較严重的一些音乐教育機構有了很大的轉变。有些学校不仅

从思想上認識到“重外輕中”对我国音乐文化事業的危害性，并着手进行教学上的改革。比如，中南音專的鋼琴系就与作曲系合作編写民族化的教材，并开始在教学上实践了。但是，我們也需要提出来，就是音乐教学中的“重外輕中”又是和“厚古薄今”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有的教师上課只講巴赫、貝多芬，最多談到十九世紀的外国作曲家（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外国音乐的現狀就根本不注意，对外国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优秀作品也不进行分析研究。至于中国古典乐曲、戏曲音乐就更談不上了。在学生畢業作業中也多着重外国古典作品。因此說，这些人“重外輕中”的思想和“厚古薄今”的思想結合在一起的。他們忘記了如何使“外为中用”这个重要的大前提。这种有害傾向今后仍要繼續反对。

从以上事实来看，不論是“厚古薄今”、“重外輕中”，或者是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思想，都是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羣众的表现，对我国音乐文化事業都是有百害無一利的。因此，要徹底克服这些有害的傾向，必須在思想上政治掛帅，真正明确为谁服务的目的。我們今天之所以反对“厚古薄今”和“重外輕中”，也正是要在音乐研究領域內拔掉白旗，插遍紅旗。使它为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服务！

要積極參加新的“采風”運動

楊 琦

目前，一個大規模的新的“采風”運動在黨的號召下正在全國範圍內蓬蓬勃勃地展開了。

在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中，在轟轟烈烈的雙反運動中，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鬥爭中，我們的人民運用各種詩歌、民謠的形式，以剛健清新的風格和雄渾豪邁的氣魄，抒發了他們心底的聲音，描繪了波浪壯闊的生活圖景。在全國各地湧現出無以數計的民歌，正如《人民日報》4月14日的社論所指出的“這是一個出詩的時代”。這些民歌反映了我們人民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表現了他們大智大勇的英雄氣概，表達了他們對黨和祖國的忠誠熱愛。總的說來，人民創作的民歌反映了我們今天的時代，因此，記錄和收集新的民歌就成為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各地已經在黨委的直接領導下積極進行記錄、收集、整理和出版的工作。文藝界和音樂界也為這一工作舉行了座談會。據我們所了解，有些地方的音協已經把收集整理民歌列入了工作規劃，並且協同其他文化部門實際行動起來了。

絕大多數音樂工作者（包括所有作曲家、理論家、演唱家、科學研究工作）都懂得，並且切身體會到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歌不但對音樂藝術的發展有重大意義，同時，

對於不熟悉民族音樂的人更是一個向羣眾學習、與羣眾結合的思想改造問題。因為，這不僅通過這一工作使我們能深入理解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其表現的方式，同時，還關係到我們創作和演唱上的根本問題之一——民族風格的創造問題。我們許多優秀的作曲家和演唱家，沒有一個不是從民歌中吸收營養來進行藝術創造的。早在毛主席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就進行民歌收集的工作，解放以後，民族音樂研究所以及各地的音樂組織也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出版了不少民歌集子。但是，都不像今天這樣全國規模的史無前例的羣眾性運動。我們完全可以斷言，這一運動將對我國音樂文化有難以估計的影響。因此，我們音樂工作應該積極參加進去，特別是已經上山和下乡，以及深入農村的音樂工作者更應該為這一工作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也許有的同志會有這樣想：目前人民所創作的多半是詩歌，即使有曲調也不過是新詞舊調而已，因而無視了這一運動對於音樂藝術發展的重要意義。當然朗誦性的歌謠、快板是比較多，同時，新詞舊調的情況也較普遍。但是，我們要知道：第一，由於轟轟烈烈的羣眾歌唱運動的展開，必然會出現許多許多為我們所不知道的民歌

(曲調);第二,由于新詞內容的要求,旧的民歌也必然会被人民加于新的加工創造,也必然会出现今天人民新創作的新民歌(曲調);第三,記錄、收集民歌,的确不像記錄歌詞那样容易,絕大多數的农民是不可能自己記錄的,即使是有文化但缺乏一定音乐常識的农民、工人,甚至有些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如果連起碼的音乐知識都不了解,也是难以进行記錄工作的。因此,就需要我們全体音乐工作者(包括中小学音乐教师)来一个总動員,大家一齐动手协助这一民歌收集运动的开展。

郭沫若同志在答《民間文学》編輯部

学 述 动 态

中国音协召开座談会

發動音乐家参加收集民歌工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为了發動音乐界同志广泛参加正在蓬勃展开的收集民歌的运动,曾于5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談会。

座談会由中国音协民族音乐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元庆同志主持。他指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民歌是大躍进的号角,收集民歌也是音乐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大家積極参加这一工作,共同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努力。繼請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林山同志为大家报告各地收集民歌的情况。林山說,在党的号召下,大多数省对这一工作已普遍重視起来,有的省委書記亲自抓,有的由文联、文化局联合搞。他說,現在一般收集的民歌只有詞,很少有曲譜,主要是記譜有困难;所以需要音乐界的同志共同合作,最好能由文学工作者与音乐工作者組成小組,一同下去收集。

座談中許多同志談到音乐工作者必須重視收集民歌的工作,并对如何收集民歌的問題提出了以下几項办法:

(1)發動一切力量深入各地收集民歌,除音乐院校的师生利用假期下工厂、农村收集外,应

关于大規模收集民歌問題时,曾談到:“收集工作展开了,研究工作要跟上去。像比較比較各省各县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的民歌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就是应该研究的問題。”这一段話虽然是对文学工作者說的,但对我们來說也完全适用。在过去,研究工作做得很不够,总是跟不上民歌收集工作。就我們过去已有的材料,都沒有很好的加以利用,从而获得比較有系統、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成果。因此,在大規模收集民歌运动展开以后,研究工作也需要大躍进,紧紧跟將上去。

組織音乐界下放干部参加这一工作。此外,中小学音乐教师是一支龐大的队伍,也应该通过教育部門把他們發動起来。

(2)大力向广大羣众傳授識譜、記譜方法可使工人、农民也能逐漸参与收集民歌的工作。同时通过識譜运动,將使羣众歌咏运动大大地躍进一步。建議各地多开办識譜班,各中等学校要在音乐教学中加授識譜、記譜知識。

(3)發動大家学民歌、唱民歌。除音乐工作者要向农民多学、多唱外,也要鼓勵农民多唱。只有發動大家多唱民歌,民歌才能保存下来,好的东西才容易被發現。

(4)文艺团体下乡时,可規定每人要帶回几首民歌,不会記譜的可学唱,回来再請別人記。

(5)对少数民族的民歌,如不通語言,可先用拼音字母記詞,再請人翻譯。

与会者并建議編印一本有关收集民歌的手冊,以指导收集民歌的工作。

艺术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里的十一篇文章是根据作者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先后次序排列的

祝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空前繁荣

譚抒真 陈洪

歐陽予倩院長在大会的開幕詞中明确地指出了当前艺术科学研究工作所应当走的道路，在整个国家大躍進中所应起的作用，每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所应負的責任，并且在最后提出了十四項研究重点。我們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

張庚同志和李伯釗同志的报告，介绍了他們在戏曲研究院和戏剧学院几年来的研究工作經驗，这些宝贵的經驗对于我們有很大的啓發，对我們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大会的热烈气氛，各單位各同志所提的指标也給我們很多的啓發和鼓舞。

我們觉得在音乐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和其他方面一样，必須和当前的现实相配合。我們要严格地批判那种资产阶级的为研究而研究，强调个人兴趣，关门提高，互不通气等等的研究方式。研究工作是整个社会建設的一个环节，因此脱离了现实，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我們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意識是很严重的。这种不良的思想意識的存在，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研究工作上來。我們必須要以最大的努力，通过批評与自我批評，通过劳动鍛煉，通过参加各种斗争和运动，通过系统的理論學習，逐步建立起無产阶级的世界觀，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只有向这个方向努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真正做好研究工作。

在这次大躍進的高潮中，上海和南京各音乐院、校也做了规划，规划内容重点放在教学改革和創作上，关于艺术科学研究方面的較少，过去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通过这一次的大会，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艺术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方針任务，也學習了不少工作方法。我們深信上海和南京音乐界的同志們在这一方面的潜在力是很雄厚的，回去向大家傳達了大会的精神，大会热烈的情况以及北京許多艺术团体的躍進规划和各位專家的个人规划的先进指标以后，一定会給上海和南京音乐界以很大的鼓舞，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上海和南京一定要向北京學習，向北京看齐，展开友誼競賽。并且以实干、苦干的精神来完成这一个偉大的任务。希望文化部和中國音協給我們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我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艺术科学研究必然要出現空前的繁荣。

最后有三个建議：（1）北京的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績很好，陈列室内容丰富，富有教育意义，可惜地点在西郊，一般的市民不容易去參觀，建議把民族音乐研究所搬到市內來，多和民众接触，起更多的作用。（2）建議在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地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特別在上海应当首先成立，因为上海的条件比較充分，成立起来不会太困难的。（3）各地方民間音乐不同的律应加以保存，好象各种方言一样，是不可能消灭的。但我們也要推行普通話，所以也建議制定一种全国性的标准律，是不是可以采用十二平均律，希望大家研究，早日确定，这个对于民族音乐的發展，以及对艺术科学的研究，关系都是很大的。

勤學苦幹，又紅又專，爭取音樂科學研究工作的大躍進！

李 元 庆

各位同志：

我們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全體研究人員听了歐陽予倩同志的開幕詞，感到萬分興奮。在開幕詞中，歐陽予倩同志對於藝術科學研究工作的方向、發展遠景以及其它許多重大問題，都提出了明確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這些意見。其他各位同志的發言，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發。我們願意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並且願意和他們展開工作競賽。

我們民族音樂研究所是在1954年成立的，到現在整整四年了。因為它是我國最早創辦的一個專門從事民族音樂科學研究工作的機構，得天獨厚，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在文化部的領導下和各方面的關懷和支持下，四年來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也走了一些冤枉路，缺點是嚴重的。現在我想介紹一下四年來我們在工作中摸索到的一些經驗和教訓，請大家指正。

一、從事音樂的科學研究工作，除了要重視書本知識以外， 還應該特別重視感性知識。

大家都知道音樂是時間的藝術。任何精確的文字或樂譜敘述，都不可能使我們真正把握着瞬間即逝的音樂形象的。只有通過聽覺（聽寫記錄），才能“抓”住它。要想從書本中掌握着音樂形象，特別是那些較為生疏的音樂形象，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民族音樂研究所自開辦以來便把民族音樂遺產的調查、採訪、聽寫、整理當做最重要的工作去做。民族音樂研究所成立以來（以及在正式成立以前）到現在，一共進行了近三十次的採訪工作。在我們一百多種出版物中，大半都是根據調查採訪所得而編寫出來的。這樣，既培養了幹部，使他們（大多是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對民族音樂是生疏的）從民間藝術家那里獲得了感性認識，同時又使他們的研究工作有了切實可靠的研究的依據。我們總覺得，特別是音樂這門時間的藝術，如果光從書本到書本地進行研究，總有隔靴搔癢之感，搞得不好，會使人愈搞愈糊塗。本來，正確的研究過程應該是從實際出發，提高到理論，然後再去指導實際，並且在實踐中檢驗它。這本是淺顯的道理，但卻常常被我們忘記，一不小心便會離開了實際，光局限在從這本書到那本書的範圍里去找真理。再說，我們書本上的記譜法又不能精確地記錄出民族音樂的風格特色來，如果不親身去從事調查採訪，獲得生動的感性知識，是難以進行研究，得出正確的結論來的。

我們是把音樂作為社會現象來研究的。因此，不能只就音樂本身去研究，還必須從人們的社會生活（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的各个方面去掌握音樂藝術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它給予社會以怎樣的影響等等。我們不能孤立的去研究音樂，必須聯系地、發展地去觀察它。不這樣，就會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方法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就必須親身進行採訪調查，了解這些音樂是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它在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什麼作用等等。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較全面的掌握着音樂藝術的特殊規律，得出科學的結論來。

二、研究古代音樂史，要注意活的材料，力求形象化。

就是研究古代音樂史，我們覺得也應該重視採訪調查工作。從我們的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出，許多古代音樂的“遺緒”仍然被保存在民間。如果我們把這些“活的”歷史材料和書本上的“死的”歷史材料互相對證，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在了解歷史時獲得生動的感性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現

存的民間藝術的歷史淵源；並且還有可能解決一些音樂史中的疑難問題。搞歷史的人，比較容易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從這一段記載到那一段記載去探索問題。這固然 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能夠同時注意存在於民間的活的歷史材料，我們的眼界就會寬廣得多。歷史的線索，源與流的关系，就比較容易被我們掌握。

例如古代文獻中有關於“吹叶”的記載。但是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印象總是模糊的。自從我們的採訪隊在湖南、貴州搜集到各式各樣的“吹叶”，並且錄了音、照了象之後，我們對於歷史記載中的吹叶，才有了深刻地理解。

又如周代的音樂，文獻上的記載不算少，但究竟怎樣，總是模糊的。我們通過信陽編鐘的測音調查，這才真正的被周代的高度的音樂文化所震驚了。此外，關於少數民族地區音樂社會功能的實況調查，也幫助我們去理解詩經中所描述的音樂生活。

音樂史中不少難於從書本中考察清楚的問題，往往可以在活的材料的對証中得到解決。例如張炎和姜白石的譜式的翻譯問題，便是從現存的民間樂譜中得到左証而解決的。我想，敦煌譜的翻譯問題，更大的可能是從活的材料中找到解決的線索。

民族音樂研究所重視古琴曲的發掘打譜工作，這不僅因為古琴是中國的一種古老的音樂藝術，同時也因為古琴曲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樂曲，可以做為音樂史的譜例。一部音樂史，如果沒有樂譜實例，就好像研究美術史看不到插圖一樣，讀者是不會滿足的。在音樂考古學中，似乎應該把古曲的發掘（古譜今譯、打譜、听寫民間古老的曲調）列為重要的項目。

無論為了普及音樂歷史知識，還是為了深入探究歷史，都應該使音樂史形象化，理想的音樂史是有譜例、有插圖、有錄音（唱片）。今天我們寫歷史，主要的讀者對象應該是廣大的音樂工作者和音樂愛好者。因此使音樂史做到形象化是十分必要的。要做到這點，除了注意文獻資料之外，應該用較大的力量去進行活的歷史資料的採訪工作。這是我們和舊的考據學派不同的地方。

三、研究工作的最終目的是為實踐服務，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服務。

我們研究民間音樂，和西歐一些民間音樂研究者不同。他們常常是為了研究而研究，或者為了尋找個人創作的素材而研究。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有着鮮明的目的性、階級性；那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的音樂文化。我們在进行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考慮到如何推陳出新、如何總結前人的經驗、如何掌握着中國民族的特殊的創作規律、如何反對和說服那些對民族文化採取虛無主義態度的人，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的。

因此，我們力求在研究工作中貫徹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研 究路綫。我們總想把人民中間最優秀的作品選擇出來以後，再推廣到廣大的羣眾當中去。《山西河曲民歌採訪專集》便是按照這個意圖去做的（當然這里面還是有很多缺點的）。

四、研究工作必須走羣眾路綫。專業的研究工作者必須和業余的研究工作者密切配合。

我國的藝術遺產浩如淵海，只有動員一切文藝工作者人人動手，才有可能把一些重要的藝術遺產搶救下來，繼承下來。此外，還得發動所有的文教工作者協助我們。

專業研究者人數有限，他們必須和業余研究者保持密切的聯繫。音樂方面的研究者還要和戲劇、舞蹈、美術、文學、歷史、考古方面的學者取得密切的聯繫，互相支援配合。要十分尊重老專家的學識，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發揮他們的專長，並且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研究工作納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洪流。青年研究人員除了向實際學習之外，還必須向老專家學習，共同為儘快地變成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而努力。這一方面，民族音樂研究所做得還很差。我們常借口忙而忽略了和各方面的聯繫，其實還是一個認識問題。此外，我們對“百家爭鳴”的政策體會得不深，也妨礙了我們去聯繫更多的人。無論如何，我們得

接受这条經驗。

五、在培养青年研究人員方面，我們没有什么成功的經驗，但可以肯定边学、边研究、边写作是行得通的。

等待一套现成的研究办法，学好了之后再接触实际进行研究是行不通的。勤学苦干，努力自我改造，向專家、向艺人學習并且做他們的助手或徒弟，把學習到的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自己采訪所得的一点东西結合起来，随时总结經驗，逐漸摸索出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来，我們青年一代的研究工作者也只有通过这些方面才能逐漸地培养出来。

青年研究工作者應該多做些資料工作和采訪工作。不掌握一定的可靠的資料，縱使懂得一些馬列主义基本原理，观点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人以为資料工作是种技术性的工作，沒有思想性，不願意搞。其实搞資料何尝不需要正确的观点？一本民歌选，一本資料彙編，即使沒有文字說明，难道說不需要正确的观点做指导么？关于資料工作問題，在我們民族音乐研究所頗有爭論，有人認為搞資料会埋沒了青年的远大前途，是大才小用。我們曾进行了說服工作和斗争，但总未能徹底解决。直到这次整風后才有了轉变。

当然，在搞資料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写些論文。題目應該容易些，先不忙写洋洋数十万字的專著。只要有实际可靠的材料，并依据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得出的必要的結論，哪怕文章很短，哪怕只能解决一兩個小小的問題，也是好的。

六、必須重視資料工作、大力积累資料。

資料工作要力求科学化、系統化。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开办之初，虽然注意到資料工作，但忽視了圖書館学、博物館学、档案学这些学科的最新的成就，因此吃了亏。一定要把較强的干部配备到資料部門中去，教育干部重視和热爱這門工作。應該學習科学的登記制度、保管技术、复制技术、編目学等。

一般的收藏家，往往只重視古籍，对当代的資料特别是油印品、講义、小册子等是不大注意的。因此我們对于当代的資料要大力去搜集，不然便不能进行現狀的研究。从音乐这方面說来，要特別注意唱片、乐譜、圖片、影片、录音膠帶、乐器文物的搜集。書目和索引也得有計劃地去做。我們很希望有人和我们共同搞出一部音乐方面的联合書目来。

以上这几条不成熟的經驗，在大家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对我們說来却是四年中逐漸摸索出来的，直到今天才比較明确起来。

我在前面談过我們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归納一下，大概有这几方面：

一、忽視現狀研究，沒有抓着音乐建設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进行研究。

我們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是傳統的民族音乐，因此只注意那些有关民族音乐的問題。对当前音乐界、文艺界許多重大的問題（例如音乐作品和理論中的修正主义傾向、黃色音乐問題、羣众歌咏运动問題等等），采取了旁觀的等待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非政治傾向，是一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态度，是脱离政治的表现。反对資產階級思想，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进行兩条道路的斗争，是人人有份的事，絕對不應該因为自己从事某一方面的專業而不表示态度，置身于战斗之外。

就是在民族音乐遗产这个範圍之內，我們也未能很准确地抓着广大音乐干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进行研究。固然人力單薄、沒有經驗等客观原因是存在的。但是我們对于現狀了解不深（例如对于黃色音乐的一度氾濫的情况，我們就不了解）、对于新鮮事物缺乏敏銳的感觉、保守思想（例如我們編寫了有关如何調查民間音乐的資料，羣众很需要，我們却怕不成熟，不敢公开出版）、研究題目太分散不能抓着重点等等，使得我們的研究远远不能滿足羣众的要求。

二、注意普及不夠，不能深入淺出。

羣众反映民族音乐研究所有些出版物过于深奥，看不懂，而他們迫切需要的讀物我們却出版得很少。固然，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不可能不进行一些較專門的研究。但是，我們必須把普及和提高結合起来，出版一些普及的讀物，滿足广大讀者的需要。

我們大概受到了《燕京学报》那样刊物的文風的影响，文字远不能做到正确、鮮明、生动、簡練。有些出版物其实內容并不深奥，但不能深入淺出用口語化的言詞表达出来，并且往往加上一个頗有“学术气”的題目，結果使广大的音乐干部敬而远之。这说明我們的羣众观点是很不夠的。

三、忽視干部中的思想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常常忘記 政治是統帥这个不可動搖的原則。

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在我們民族音乐研究所，学术上的爭論是不多的（虽然并非沒有思想斗争），但一般的思想問題却特別多。例如重視西洋，輕視民族遺產，長久以来不能得到糾正。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民族乐器之声并不兴旺，但鋼琴之声却洋溢滿楼。青年干部对于學習西洋管弦乐法、和声学、西洋音乐史、西洋作品分析等等总是十分熱心的，但却很少人要求去學習工尺譜、昆曲、古琴、琵琶。固然我們不應該閉門自守，不向外国學習，但身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对于民族音乐興趣不大，总是件令人担忧的事。原来，这些同志並沒有把民族音乐的科学研究工作当成自己的終身事業。他們是抱着熟悉一下民族音乐、取得一些創作的素材来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最大的願望还是采用民族音乐的曲調做为素材写出一部交响乐来。这种想要創作出具有民族色彩的大作品出来，是不可厚非的。我們也主張搞些民歌改編工作，在不妨碍研究工作的原則下多写些音乐創作。但是把創作和研究工作对立起来，并且希望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工作朝着适合个人創作願望的方向發展，就不对头了。

我突出地把輕視遺產这一問題做为例子提出来，当然并不是沒有比这更严重的問題。例如不愿意搞集体采访，想兩耳不聞窗外事，單打一的搞出一本書来；強調志願和興趣，不願有任何劳动紀律和工作計劃的約束；想把資料做为私有；鬧不團結……等等。总之，四年来，特别是經過了反右派斗争，使我痛切的感到的一条經驗教訓就是要想領導好研究工作，必須加强思想領導，及时和各式各样的资产階級思想做不調和的斗争（包括自我思想改造在內）。

感謝党所領導的偉大的全民整風运动。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展开的反浪費反保守运动帮助我們从这样那样的资产階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来。民族音乐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員在“勤學苦干，爭取音乐科学研究工作的大躍进，爭取尽快把自己鍛煉成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的战斗目标的鼓舞之下，初步拟定了躍进的計劃。过去民族音乐研究所業務人員共42人，平均每年出版書刊約30种，每人的产量悬殊很大。今年人員減至25名，并且計劃以半年的时间投入資料的清查工作，但仍計劃出版書刊49种。由此可見當我們的精神的生产力通过偉大的思想运动得到解放以后，可以發揮出多么大的力量来！

在躍进計劃中可以看出民族音乐研究所今年的写作計劃和过去不同的地方是：（1）增加了通俗讀物的比重；（2）开始了近代音乐史的編写工作；（3）注意当前的問題，把評論列入計劃，并将較有組織的来进行这一工作。

看来，我們还躍进得不够，我們將根据座談会的精神加以修改补充，爭取今年在政治上、業務上来个大丰收。

下面我想提几点建議供領導参考。

一、現在研究理論队伍的干劲高漲，但理論研究的力量是比較分散的，并且大都負責教學、創作、演

出工作,研究工作很容易被挤掉。我們建議文化部在会后能够發布指示,指明研究工作的方向,要求各級领导重視研究工作,并且拟定一些具体措施,給研究者以必要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時間的保証)。

二、一般說来,各有关单位的科学研究规划,技术理論研究、遗产研究方面的論著較多,对現狀的研究較少。建議文化部通知各地建立戏剧、音乐、美术等評論和理論研究小組,以便較有計劃的开展評論和理論研究工作。請部领导考虑一下究竟那些問題是最值得我們重視的研究課題,这样就可以帮助各研究机构明确它們的研究重点,使它們的研究工作可以密切联系实际。

三、目前各研究單位和艺术院校都做了一些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是大家的經驗都不多,急待交流經驗,拟出一套較完整的、統一的管理办法来。我們建議召开一次資料工作會議,从速解决資料工作中存在着的問題。在人力和經費方面,对于那些确有困难的單位,亦希适当地增加一些。

四、希望文化部对于艺术各部門的陈列館拟定一个远景规划。

五、建立搜集和調查国内外艺术科学研究情况的情报組織。

六、在大躍进中,大家都表示願意把稿費全部拿出交公。这种政治热情是很感动人的。但从我們搞行政领导的人看,还得根据党中央关于双反运动的指示慎重研究。我个人初步的意見是要看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学校、演出团体与研究單位不同;在業余時間挤出時間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应与專業的研究工作者不同;同是專業的研究人員,花費了較大的精力完成的著作应与費力較少的著作不同;对于迫切需要的論著和学术价值較高的論著应与一般論著不同。总之这問題有待有关方面共同拟定一些原則和較為灵活的条例交各單位試行。

我們的成績和我們的躍进

查阜西

我代表一个只有三十个人的業余小团体——古琴研究会在这里發言。首先,我們表示拥护歐陽予倩院長提出的1958年艺术科学十四項研究重点规划。

其次,也作为报喜,我們古琴研究会在三月十二日的會員大会上作了热烈的躍进計劃。

我們体会到,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思想战綫上和政治战綫上展开斗争,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取得反右的胜利后,人們才不断發現潜力,坚决反对保守,要求提高劳动态度,積極加强集体力量,掀起了今天的大躍进运动。古琴研究会虽然只是一个三十余人的業余社会团体,但由于它一直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所以它的會員們及时地鼓起干劲卷入了这个高潮,訂出了躍进計劃。請允許我們也来作一个报告,为業余社团的躍进也在文艺队伍中提出一个例子。

大躍进是現阶段專上加紅和推陈出新的重大体现,古琴研究会几年来的工作已經使古琴紅了一些,新了一些,今天的躍进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如何去再新再紅。

在1953年文代会后,我們就在晋协领导之下开始活动,最初是相当散漫的。我們紅和新的成績是我們在有了正面领导之后才取得的。

1954年5月,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晋协給我們定下了古琴研究会这一名称,訂下会章。指定我們的工作是研究、演奏、傳習三个方面。这是結合着当时古琴已經受到广大羣众欢迎,才在这三方面明确目标,要使它更好地为广大羣众服务。在当时广播电台要古琴节目,戏剧要古琴插曲,电影要古琴配音,音乐界要理解古琴;有些社会青年要学古琴,广大羣众要听古琴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晋协把我們的工作放在这三个方面显然是極其正确的。几年来我們在这些方面做了下面这些工作。

我們为中央、东北、天津各广播电台供給了將近三十个琴曲的录音,有些制成了唱片;我們用器内

演奏的形式支持《屈原》的演出达一个半月之久；也为《虎符》的演出教会了“人艺”的演员；我们与“新影”的管弦、民族两队合配了新片；我们为各新闻社、出版社、电台写了不少介绍古琴音乐的文章；我们为造琴专业者和造弦专业者及时地提供过十几万字的历史科学资料；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有的参加了国家乐队，有的则是国家乐队的青年被我们培养成可以演出古琴节目的水平，前后传习业余古琴演奏者将近五十人，除吴景略是音乐学院直接吸收的以外，国内四个艺术院校新设古琴专科教师都是我们介绍或影响去的；我们恢复了汉代就有的琴箫合奏形式和明代流行的琴歌形式，并且使这些合奏的形式发展为十六人乐队的形式（《普庵咒》、《平沙落雁》），和把琴歌发展为大合唱形式（《苏武思君》），在国内甚至国际获得狂热的好评；我们和国内外三十多个地方的琴会和琴人经常在通信中讨论古琴的学識，交流演奏演出的经验，通信数量逐年大增加，最显著是我们在几年的演出中和我们见面的观众已不下十五万人，这改变了我国“独弹古调少知音”的史实，我们已使古琴变成了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了。仅从这些现象检查一下，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和音协领导之下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不难看出，我们的这些成绩，是党领导着我们发挥集体力量，结合实际、联系群众的結果，我们本身倒是有许多缺点的。

我们较大的缺点，是从统计上看出来的。从1953年11月到1957年底，按每星期日会演或排练一次，应有二百十二次，但我们只会演了一百四十一一次，参加人次只有饱和点的45%；独奏与合奏的总人次只有61%；伴奏人次只43%；八个合奏琴曲中有六个只排练两次到六次（只有《普庵咒》排到七十二次，《平沙落雁》排到二十三次）；发掘古谱的只有四人，多的在四年中只得着四曲；除了参加1954年巡回演出之外，五年中只出演三十五次，即平均每年只出演七次。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的会员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因此，我们也要订出跃进计划。

根据到会二十九人的全体同意，和二十一人的书面规划，我们决定在1958年内完成下列任务：

1. 将会演与排练的次数从过去的60%提高到100%。
2. 使参加会演排练的人次从45%提高到90%以上。
3. 保证独奏人次从43%提高到至少95%。
4. 做到使原有八个合奏曲排练的次数平衡，并增两个合奏曲。
5. 创作并改编七个琴曲七个民乐曲。
6. 十个会员争取发掘古谱二十七曲（两百年来最优秀的古琴家要三年才能发掘一个琴曲，我们要翻九翻）。
7. 八个会员保证学会十八个新曲。
8. 五个会员保证整理十九个旧曲。
9. 六个会员负责将每年平均传授十个琴生提到传授二十个琴生。
10. 八个会员提出撰写古琴资料、教材、史料、插图等二十种约六十五万字。
11. 另外一个会员争取写出一部有关古琴现代题材的话剧或电影，还有一个会员争取制成合奏的七调填和九孔填。三个国家乐队的优秀演员争取在业余时间学会古琴，达到独奏的水平。

我们的跃进计划，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我们愿意姑且提出来，向各地的古琴会和古琴家作友谊的挑战，希望一同鼓起干劲，激励我们一同更好地去为工农兵服务！

展开中国音乐史的科学研究工作

除 法 魯

我有机会参加这个座谈会,觉得非常兴奋。听了欧阳予倩院长和其他各位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以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很多的教益。

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之下,艺术科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天在各方面大跃进的新形势推动之下,艺术科学的大跃进完全是可能的。发展艺术科学的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出来,只要把人力组织起来,把工作坚持下去;而参加工作的人又都有政治思想上的大跃进,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我们的规划就一定能如期完成或超额完成。

欧阳院长说:“任何研究工作总是为现在,为将来,决不是为过去服务;为前进的事业,决不能停滞在原有的状态中。”所以说研究工作应具备现实性。研究音乐史的人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写出来的音乐史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促进的作用。音乐史能起些什么作用呢?音乐史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代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告诉人们,民族音乐有些什么特征?是怎样形成优越的传统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些什么问题?解决问题时取得了什么经验教训?我们的音乐传统加强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且提供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音乐的凭借。我们的历史经验也会变成处理当前音乐问题的智慧。

音乐史也是有战斗性的。在研究过程中要批判一切错误理论,首先对轻视民族音乐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作斗争。这种虚无主义思想,是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轻视民族音乐的是些什么人呢?绝对不是劳动人民,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

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笼罩在它们的魔掌之下。和帝国主义侵略相伴随,欧美近代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大量地传到我国来。从清朝末年以来,欧美文化更通过各级新式学校的系统,向我国各个角落渗透,因此,欧美的音乐对于我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影响的,以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造成了喧宾夺主的恶果。

也许有人要问:在唐代前期,西域音乐曾经大量地传进来,经中原音乐吸收之后,加以适当的处理,便对唐代音乐的兴盛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明朝末年,欧洲的音乐也由西方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传进来,虽然受到少数的中国士大夫的欣赏,但对我国音乐界没有引起很大的变动。为什么清朝末年以后欧美音乐在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应当这样考虑:欧美的近代音乐是欧美近代文化的一部分,欧美的近代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传到我国来,就排斥我们的民族文化。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的人民,毁谤我们的文化,恶意地进行歪曲的宣传。而买办阶级分子如胡适、潘光旦、李景汉等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唱和,更“变本加厉,踵事增华”,竭力散布民族自卑情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污痕。同时,近百年来,特别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切音乐戏剧活动日趋消沉,因此,给人们一种错觉:民族音乐并不见得丰富多彩。

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有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但在旧中国里既不可能展开普查工作,也不可能就已有的文字资料展开全面的整理、研究工作。自然更不可能总结出全部经验,提炼出精华,把它们转交给人民。

解放以后,在党的正确的文艺政策领导之下,民族音乐得到重视,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才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正如欧阳院长所说的:“艺术科学的理论队伍比较分散,也就显得比较薄弱”。资料也比较分散。因此,为了音乐史研究工作的大跃进,我想提出下面的一些建议:

一、加强党的领导,组织起音乐史的研究力量来。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为主要力量,另

外組織其他力量,把零星的研究工作都納入整個的規劃里。

二、資料工作,統籌安排;研究工作,百家爭鳴。關於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些是重複的,應當分工協作,以免浪費人力物力。例如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曾從《全唐詩》里輯錄出來有關舞蹈的一些資料,正準備付印時,又接受了民族音樂研究所李元慶副所長的建議,把有關音樂的資料也輯錄出來,編成音樂舞蹈資料彙編。這樣,舞研會的同志們因為讀過一遍《全唐詩》,在做第二道工作中比較省力,而民族音樂研究所也不必另組織人力投入這項工作。科學研究不必避免重複,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即使見解相同,在科學研究中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可以互相印證,步步深入。

三、研究工作應逐步走向集體主義的道路,“孤軍深入”不但因為缺乏別人的協助,難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因為缺乏切磋琢磨的機會,也很可能走彎路或誤入歧途。如果採取集體主義的方式,即可互相啓發,彼此支援,從而推動整個工作迅速前進。

四、通盤考慮,筹建學術據點。各個學術據點集中了比較多的資料和人才。為了更方便地進行科學研究,在北京的幾個藝術研究單位如民族音樂研究所、戲曲研究院、舞蹈藝術研究會、曲藝研究會等,可否考慮合併成一個大機構。在這個大機構里分設各種藝術研究部門。中國音樂史和舞蹈史很難分開,從宋元以後,音樂史和戲劇史也不能分開。如果這几种藝術史的研究工作能打成一片,科學研究的質量和效率都會大大提高。各地方可斟酌情況,筹建學術據點,就地取材,進行研究工作。如果從事音樂史的研究,也可以結合當地的音樂傳統。如湖南、湖北可側重“楚聲”的研究,江蘇、浙江可側重清商樂的研究,四川可側重巴歌渝舞的研究,各兄弟民族地區可側重兄弟民族音樂史的研究。

五、音樂史工作者還應當和歷史、文學史、考古工作者保持密切聯繫。解放以後,歷史學界着重研究的是歷代的經濟基礎問題,這是歷史學上的根本問題。音樂史是經濟基礎所反映的上層建築的一方面,不是游離於社會發展史之外的東西。因此,研究音樂史就要參考歷史學家的結論,也從經濟基礎出發。否則我們對音樂史問題的一些論斷,就可能“游談無根”,變成水上的浮萍。歷史學家也需要音樂史來檢驗他們的結論,需要音樂史的幫助來說明歷史的全貌。中國文學史和音樂史也是不容易分開的。研究音樂史的如果不問文學史,音樂史的材料就會顯得非常貧乏;研究文學史的不問音樂史,對某些文學體裁的來源和流變就說不出所以然。解放以後,由於各地進行基本建設以及大規模地進行發掘工作,出土的文物非常多,為音樂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而音樂史的研究也為考古學解決了一些問題。諸如此類的協作,對各方面都有益處。

六、音樂史工作者應加強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習,參加勞動鍛煉,不但用正確的观点、方法來處理史料,解決問題,而且把勞動人民的感情灌注在音樂史的著作里。

七、有些青年把音樂史的研究工作看成是高不可攀、神秘莫測的事情,往往不敢問津。估計到科學研究的艱巨性,當然是必要的;但以青年的學習熱情、研究條件而論,只要刻苦鑽研,很快地就會作出成績來。特別是有知識的青年研究專史,如有音樂知識的研究音樂史,有舞蹈知識的研究舞蹈史,一突破閱讀古文的一關,接觸到原始資料,他們就能提出新的見解。他們有很活潑的聯想的能力,老專家們多用一些時間予以指導,它們一定有很大的成就。

八、編輯音樂史方面的必要的工具書,如目錄、索引之類,供研究者和一般讀者應用,可以節省時間。

九、有些中學的音樂教師說,他們很願意向學生介紹一些民族音樂的知識,但苦於缺少適當的教材。為了適應他們和一般讀者的需要,音樂史工作者可集體編寫一本《中國音樂文化史》之類的書。內容範圍比一般音樂史要廣泛一些,除了樂曲、樂律、樂器的歷史以外,還有歷代人民的音樂活動,音樂所反映的社會面貌,音樂的作用和影響,音樂所反映的民族間以及國際的文化交流和友好關係,音樂家的傳記,等等。和歷史課配合起來,學生會感興趣的。

以上的一些意見很不成熟,提出來供大家參考,並請批評。

在藝術科學大躍進的時候,我願意竭盡自己的能力加快地做好人民所需要的工作。

打掉邪气,开展民族化、大众化的音乐科学研究工作

廖 辅 叔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发言。

我們是从天津来的,昨天下午才赶到,所以沒有机会听到好些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但是昨天听了同志們的发言,又补看了分發的材料之后,我們得到了很大的啓發和鼓舞,我們完全同意歐陽予倩院長的报告,而且要把这篇报告和座談會的精神帶回去,向院內同志做詳細的傳达,讓我們院的同志从中吸取力量加速我們在艺术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躍进。

反右之后經過先生对先生、学生对先生的面对面的批評和大字报的批評,歪風邪气是給打掉了。我們一般說是打掉五气,但是我們还有一些應該打掉的特殊的邪气就是学究气。学究气,它的表現是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傳統、脫离羣众。針對这种情况,我們定下来的艺术科学研究計劃大略如下:

一、目 标

爭取在三年至五年內,在民族和声、复調中国化、歌曲作法、歌剧作法、民族乐器改革、民族乐队編曲、民族管弦乐配器法、民間歌唱、古代声乐理論研究、音乐史、音乐美学、西洋乐器演奏民族化等項目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点或研究中心之一。

爭取在本年內,全部教授及有条件的講師(約佔二分之一)都能人人参加科学研究工作,青年教師必須参加某一研究項目为助理,达到人人無例外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加强馬列主义特别是哲学、思想方法的学习,五年內达到絕大多數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运用馬列主义思想方法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科学研究工作选题

調式和声的研究;中国調式和声的研究;复調音乐教学的民族化習題的編写;中国音乐中的和声因素的研究;中国音乐中的复調因素的研究;中国革命、羣众歌曲的作法特征的研究;聶耳、星海的歌曲作法的研究;傳統歌剧作法及表現方法特征的研究;古琴、琵琶、箏、管、洋琴等民族乐器的改革;民族乐队乐器編成的研究;民族乐队音乐表現特征的研究;民族管弦乐配器法的編写;民間歌唱技术、表現方法特征的研究;古代文献中的歌唱方法的研究;巴尔托克的研究;巴赫的研究;音乐美学的各个研究范疇及研究方向的初步研究;民族化視唱練耳教材的編写;提琴族乐器中国化練習曲的編写;各种管乐器中国化練習曲的編写;中国調式首阶的鋼琴練習曲的編写;初学的鋼琴、管弦乐的民族化教本的編写;傳統音乐作品分析;音乐学生的民族音乐文献必讀書目的編写;古代民族乐器箏篪、排簫的改制及演奏的研究。

这里要說明一下,这些中国化教材的編写是动员各系师生的力量来进行的,为了进行理論研究和这一方面的新生力量的培养,現在已經成立了一个音乐学系。这是最年輕的一个系,它还不到兩岁。建系的工作和課目的安排會經得到苏联音乐史專家康津斯基同志的帮助。

为了把音乐真正能够送到羣众中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羣众的音乐水平,音乐学系在大躍进中提出了接近羣众联系实际發揚民族傳統的规划,在出版方面編写通俗讀物,內容大略分为音乐欣賞方法,乐曲分析,音乐故事等等,今年一共要写六十本左右。此外还要根据聶耳、星海及一些外国音乐家的生

平或歌剧本事写成连环画面的脚本,以小人书的形式出版,今年内预定写出九种。在介绍工作方面给本院的音乐会节目加上浅显的解说音乐会的性质,替电台音乐节目写解说稿,并定期举行电台音乐講座,定期到工厂和羣众艺术馆举办音乐欣赏会。同时特别注重加强音乐評論工作,有介绍也有批評;对黄色音乐进行坚决的斗争,从理論上、实践上消除黄色音乐的毒害。除了介绍高級的輕音乐作品之外,更注意发动大家多多创作輕音乐的作品,破除写輕音乐是降低身份的想法,因为羣众是需要音乐生活的,你不去佔領这个陣地,黄色音乐就会乘虛而入,这中间是没有退讓的余地的。

以上是我們科学研究計劃結合民族傳統和实际需要的一个輪廓,有不妥当和不完备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教。

以最大的革命干劲,苦战三年

易 劍 泉

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歐陽予倩院長关于爭取艺术科学研究大躍进的講話,同时拥护他所提的1958年艺术科学十四項研究重点规划。

我是代表音乐家协会广州分会参加这一次的艺术科学研究座談会的,音协广州分会自从接到中央关于艺术科学研究的指示,即召开了會議作出关于广东地区音乐部分的科学研究初步规划。現在大致向各位同志介紹一下,希望通过大会得到帮助,使这个规划更加全面,更加明朗。

音协广州分会的音乐科学研究初步规划分为五个大点,主要是“通过各部門的專門研究,一一編成專著,在三年之內全部完成。有些是1958年完成,所以定为“音乐科学研究三年规划”。

规划的内容,第一大点是关于戏曲音乐的研究,1958年完成初稿1959年定稿,第二大点是广东民間音乐的研究,1958—1959年部分完成初稿,1960年全部完成。第三大点是关于广东音乐教育史料的整理及研究,1960年完成广东音乐教育史料彙編初稿,1961年修正,1962年定稿。第四大点是关于音乐美学的研究,陸續出版音乐評論的專論和論文集。第五大点是1958年着手进行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間广东地区歌詠运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59年完成。

以上就是音协广州分会音乐科学研究三年规划的内容,在这里应该說明的是广东地区音乐方面从来未有專門从事理論研究的人,偶然有些業余性的理論研究也不过是片断的,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也沒有系統。如果要实现这一个规划,要在党的领导下,除了專業人員之外,必須依靠羣众和業余音乐工作者。但是沒有从事理論研究的專業人員也未有理論研究的專門机构,仍是有困难存在的。歐陽院長講話中说过,艺术科学方面有很大的潛在力量,必須广泛地动员起来团结起来,还要大力培养研究干部,要完成这一工作,也就要注意到專業人員的安排,这一点希望有关部門加以研究。今后我們还要把过去做音乐实际工作的脱离理論,研究理論的脱离实际的一般傾向改变过来。

广东地区的音乐工作者經過了反右整風以及又一次的文艺整風运动,都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明确了在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兩条道路的斗争的重要性,加强了信心,發揮了積極性,响应了党的号召,掀起了大躍进的高潮。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貫徹多、快、好、省的精神,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最大的革命干劲,苦战三年。更体会了第二个五年計劃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的指示,当然1958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必須創造好有利条件,打下第二个五年計劃的良好基础。在音乐界方面我們首先要使音乐界的队伍,三年后根本改变面貌,成为促进派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的音乐队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文化担任先鋒队。因此,音协广州分会已經初步訂出了反保守、反浪費工作全面大躍进的规划,以貫徹中央指示的精神。这里不再把规划內容詳細报道,应该指出的是自从